



掀开中国文化新的一页

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文化战线的领导

余信红 著



掀开中国文化新的一页

——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文化战线的领导

余信红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掀开中国文化新的一页: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文化战线的领导/余信红著—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2000.11

ISBN 7-210-02340-2

I.土… II.余… III.①中国共产党—党史—研究—1927~1937 ②文化史—研究—中国—1927~1937
IV.D2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7262 号

掀开中国文化新的一页

——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文化战线的领导

余信红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昌市湖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.375

字数:180 千 印数:1-1000 册

ISBN 7-210-02340-2/D·355 定价:13.80 元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: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

邮政编码:330002 传真:(0791)8511749 电话:(0791)8511534(发行部)

E-mail:jxpph@163.net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 言

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的几年,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,这是因为世界上各种文化、思想、主义在中国激烈地角逐,令人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

1920 年,一位 20 多岁的北京人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宣告了一个令“老外”瞠目结舌、令国人欢欣鼓舞的结论:“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”!这是后来成书的那本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里的原话。这本书在以后的几年里一连印刷了 8 次。几乎与此同时,一位 20 出头的“东方稚儿”从北京出发北上,“灯塔已见,海道虽不平静,拨准船舵,前进!前进!”“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。”这是另一篇同样出名,被称之为中国第一篇报告文学——《饿乡纪程》里的原话。与梁漱溟截然不同的是,瞿秋白得出的是另一种感受:东方稚儿薰陶于几千年的古文化中,“然而东方古国的稚儿到此俄罗斯文化及西欧文化结晶的焦点,又处于第三文化的地位,不由他不发第二次的反映,第二次的回声。”这种“第二次的反映”、“第二次的回声”是什么呢?“‘我’将成什么?盼望‘我’成人类新文化的胚胎。”“我自是小卒,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,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,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。”^①很显然,这是一种新的文化,是一种“新道路”的文化观。

在这段时间里,与瞿秋白一样萌生新文化观的大有人在,不同

^① 《瞿秋白文集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,第一集第 165 ~ 166 页。

的是这种新文化观的萌生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现象分析之基础上的,因而显得比前者基础更为扎实。1919年,毛泽东在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》一文中说过:“中国的四万万万人,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。迷信神鬼,迷信物像,迷信命运,迷信强权。全然不认有个人,不认有自己,不认有真理。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。”^① 1920年7月31日,他又在《发起文化书社》中说:“新文化,严格说来,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。若说这话没有根据,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?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认得清字,懂得清道理?”^② 这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正确估价。但在探究原因上,却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和当时的不少启蒙人士一样,以为是“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”。可喜的是,毛泽东在此时已经发现了北冰洋的“一枝新文化小花”。当毛泽东汲取了这支“新文化小花”的养料,并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,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。他在《湖南运动考察报告》一文中有着精确的分析:“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,农民没有文化。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,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,不是别的,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。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,这个里面,最大多数是农民。”这是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中国的文化状况所作出的正确解释。基于这一认识,毛泽东力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化,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思想文化影响颠倒过来。因为,“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,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”^③。在报告中,毛泽东提出了“十四件大事”,其中有两件:一件是“普及政治宣传”,一件就是“文化运动”。

时至今日,关于文化的概念,据有人统计有250多种,还有广

① 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,第305页。

② 《毛泽东早期文稿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,第498页。

③ 《毛泽东选集》,第一卷第39页。

义、狭义之争。那么在新文化运动经历了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之后,人们是怎么认识的呢?这里可以举出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、“五四”运动的总司令,陈独秀于1920年4月在《新文化运动是什么》一文中曾下过这样的定义:“文化是对军事、政治(是指实际政治而言,至于政治哲学仍应归到文化)、产业而言,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。文化底内容,是包含着科学、宗教、道德、美术、文学、音乐这几样。”^①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这一理解比较狭窄,即将政治学与“产业”科学剔除于文化之外。倒是梁漱溟给文化下的论断来得爽快:“俗常以文字、文学、思想、艺术、教育、出版等为文化,乃是狭义的。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,意在指示人们,文化是极其实的东西。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、政治、乃至一切无所不包。”^②

鸦片战争以后,文化问题上的论战迭起:学校科举之争、中学西学之争、文言白话之争、东西文化之争等等,从未间断。这些论战不仅仅反映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动向,而且反映着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变化的趋势。“五四”运动以后,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重新探讨,由于接受了新的“主义”,两种文化观正面交锋,尤其在东西文化论战中表现得更加突出。争论的重点不在给文化以何种定义,而在于这种文化是如何产生而又将建立怎样的新文化。1923年,瞿秋白从苏联回国,重办《新青年》作为党的理论季刊。在《新青年之新宣言》一文中,公开宣布《新青年》是“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”,具有鲜明确定的阶级性、党性、革命性,提出“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,自哲学以至于文学,作根本上的考察,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”。也就是说,要以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文化。紧接着,他便投入了东西文化的论战。3

① 《陈独秀文章选编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,上册第512页。

② 梁漱溟《中国文化要义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,第209页。

月,瞿秋白在《新青年》季刊上发表《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》一文,对东方文化派尤其是梁漱溟的“人的意欲是一切文化的源泉”的观点提出了批判,针对梁把意识性的东西当作社会现象的根源的唯心主义文化观,瞿秋白指出:“所谓‘文化’是人类之一切‘所作’。一、生产力之状态;二、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;三、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;四、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,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,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时间、一定空间中之‘所作’,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。”^①用我们今天的评价来说,就是已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作为指导思想观察社会,阐明文化的发生、发展和作用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,“社会主义文化”字样的大旗举起来了。

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:“在‘五四’以后,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,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,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。”^②但是这支“生力军”从它诞生的那天起,就一直处于被打压、掐灭和“围剿”之中。为什么会这样?列宁的“两种文化论”对此作了极好的注解。

1913年12月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,列宁写下了《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批评意见》一文。文章提出了著名的“两种文化”的学说,列宁说:“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,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,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,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。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(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),而且这不仅是一些‘成分’,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。”^③列宁的论述,阐明了一个文化史上的

① 《瞿秋白选集》,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15~16页。

② 《毛泽东选集》,第二卷第697页。

③ 《列宁全集》,第20卷第6页。

基本事实:民族的内部是划分阶级的,而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。因此,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渗透到文化领域,民族文化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,形成“两种文化”的差别和对立。自有阶级以来,任何超阶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,这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客观规律。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呢?这是因为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。这就是说,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,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。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,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,因此,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,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”^①。

中国近、现代巨大的社会变革,一直伴随着文化上的深刻变动。共产党人的文化主张、文化革命也是有自己的目的的,是以新文化作为自己社会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。“我们共产党人,多年以来,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,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;一切这些的目的,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。”^②

有一种对文化的认识为笔者所接受,概括起来大致是这样的——先从文化的起源和实质来看: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,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,既改变人类的生存条件又改变人类自身。这一方面是使自然界“人化”,即按照人类的需要来改变自然物的形态,使之变为“人化自然”,这里就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力量;同时,人类又改造着社会,使之适应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,这里同样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力量。另一方面,人类的需要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发展

^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,第一卷第52页。

^② 《毛泽东选集》,第二卷第663页。

变化的,人类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也是发展变化的。正是人类的社会实践,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。而无论哪一方面,都是以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形式表现出来;物质成果又是精神成果的物化形式。因此,可以说,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,不断创造着精神成果,这便是文化,或者说是精神文化。当然,也可以把物质成果叫物质文化,精神成果叫精神文化,但不能不记住,物质成果是精神成果的物化。这样,人类的文化,表现为对自然界的认识,即自然科学;表现为对社会的认识,即社会科学;表现当时人类自身的思维 and 自然属性的认识,即人类科学;表现为对自然、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审美掌握,即文学艺术;而对这一切的高度概括的认识,则是哲学;要把人类的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,则是教育的功能。传递的手段,一是物化,即凝结在一定的物质形态中,一是文字和音像。所有这些,就构成了文化系统。

再从文化的分类来看,精神文化分成两类:一类是指意识形态,即一定社会中的政治和法律思想、道德、宗教、艺术、哲学和绝大部分社会科学这一类社会意识形态;一类是指自然科学、语言学 and 形式逻辑等社会意识形态。

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,是它在阶级社会中有鲜明的阶级性。其中,尤以政治和法律思想,最直接、最集中地反映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,并且给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很大的影响。正是意识形态,主导着一定社会的文化。按照唯物主义的理解,首先承认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表现,诚如毛泽东所说:“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。”其次承认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,它本身还有自己发展的历史。第三,承认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反作用,毛泽东说:“一定形态的文化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。”

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,该理论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:

一是阶级性,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来领导的;

二是革命性,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;

三是民族性,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,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,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;

四是科学性,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,主张实事求是,主张实现真理,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;

五是群众性,为全民族 90% 以上的工农民众服务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。这个时期,“内战代替了团结,独裁代替了民主,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”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“从地下爬起来,揩干净身上的血迹,掩埋好同伴的尸首”^①,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坚持革命斗争,并以土地革命为中心,创造了以农村包围城市,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。

这个时期,是文化战线上“围剿”和反“围剿”大搏斗的时期,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。作为“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”的文化战线,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,过去虽然有人对此已作了一些研究,但是同政治的、军事的研究方面比较,还显得很不够。

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同时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国民党“围剿”进行抵抗和攻击,文化战线的工作又在“红区”和“白区”同时展开,时间长、战线广、问题多,加上环境险恶,情况复杂、正误相交,因此,研究的难度较大,有的学者虽然对文化专史有研究,但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系起来研究则不多。党对这条战线到底是怎样领导的,有什么经验教训,至今尚缺少系统的总结。以至于有人认为,这一时期中共忙于武装斗争,没有也

^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三卷第 1036 页,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二版。

无暇顾及文化工作。有文章说：研究“左翼十年”或左联，“首先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廓清共产党对左联起了甚么的领导作用。长久以来，我们看到无数文章，都充分肯定‘左联’是由中共领导的，但具体领导是怎样？似乎没有说得清楚……我很同意陈漱渝先生所说的党中央‘基本上没有直接过问左联的工作’的说法，过去这是没有很多人愿意或敢于说出来的，但这却应该是接近事实的。‘左联十年’（也称左翼十年，1927年至1936年）以论争开始，以论争结束；‘左联’后期内部出现的分歧以至矛盾，不就是正好说明了‘左联’并没有从党那里得到明确清晰的指示吗？”^①在60多年以后，由“左翼十年”研究的专家提出这一问题，由此看来，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文化战线的领导，“廓清”党对“左翼十年”起了什么领导作用，实属必要。

毛泽东曾经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将“五四”以来的文化革命分为4个时期：第一个时期是1919到1921年的2年；第二个时期是1921到1927年的6年；第三个时期是1927到1937年的10年；第四个时期是1937年到现在（1940年）的3年^②。本文所讨论的“1927到1937年”的10年，即毛泽东所说的文化革命的“第三时期”，恰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年代相吻合，故仍采用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”的习惯用法。这一时期的特点，“是一方面反革命的‘围剿’，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。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‘围剿’：军事‘围剿’和文化‘围剿’。也有两种革命深入：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。”^③因此，文化战线上“围剿”与反“围剿”的斗争，文化革命如何随农村革命的深入而发展，亦是本文的重要内容。

① 王宏志《文学与政治之间——“左联”研究的几个问题》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，1991年第6期；该文所引陈漱渝的观点见陈漱渝《关于左联的随想》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，1990年第5期。

② 《毛泽东选集》，第二卷第699页。

③ 《毛泽东选集》，第二卷第702页。

本文的另一目的,就是想探讨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,因此,各章的安排基本上是按历史的发展,但因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文化运动在“红”“白”两区的情况不同,本文划分为两个部分,各章安排基本上是按着历史的发展过程,但因有红区、白区,有两种政权的对立,有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根据地,为更集中地反映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运动,又没有完全按时间划分,而把长征前的根据地文化运动单独设立了一章。因此,分为四个章节:第一章大体上从大革命失败后至1930年冬;第二章为1931年初至1935年7月;第三章反映苏区的文化运动情况,时间从根据地建立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;第四章为1935年8月左右至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前后。

1980年7月21日,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发出一个21号文件,《关于统一领导妥善解决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通知》,其要解决的就是这一时期即“革命文艺运动”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。文件说:“随着进一步解放思想,涉及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看法,文艺界对革命文艺运动历史上一些问题的争论也有所发展,如对鲁迅著作的研究,对党内路线斗争同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,对某些重要史料确切性的评价等等,都有截然不同的意见。在有的争论中还出现了一些不够注意团结的现象。”为此,中宣部提出如下意见:第一,组织一个研究组;第二,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问题进行调查访问;第三,组织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的老同志写回忆录;第四,对原则性是非、重要人物、事件的历史性评价有很大分歧意见的,暂不在公开刊物发表,编辑历史资料专辑;第五,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,研究小组起草关于对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结论性的报告,经中央组织部、中央宣

传部领导讨论、审查、议定后，报中央审批^①。这5点意见的前4点都贯彻执行了，但是改定后报中央审批定案的“结论性报告”从未见过，走访过不少搞过这一课题的前辈也都称从未见过，倒是见过研究小组的一个“征求意见稿”，比较简单，因从未发表本文也就不引用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纯属学术性论文而非“结论性报告”，其中的不少观点自己认为是从材料中自然得出来的，但囿于学术水平所限，只能是一家之言。

① 中宣部办公厅编《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》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二集第787～789页。

目 录

引言	(1)
----------	-----

第 1 章	文化战线新的一页
-------	----------

一、白色恐怖	(1)
二、再创报刊,聚集队伍	(4)
三、反对三民主义	(16)
四、翻译出版与国情之争	(28)
五、高举大旗	(35)
六、错误	(49)

第 2 章	文化“围剿”与反“围剿”
-------	--------------

一、文化“围剿”	(56)
二、反文化“围剿”	(61)
三、两个高潮	(74)
四、文化统一战线	(87)
五、斗争新变化	(96)
六、教训	(103)

第 3 章	根据地的新文化
-------	---------

一、红色报刊	(11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目录

二、干部培养	(118)
三、国民教育	(124)
四、红色戏剧	(131)
五、“左”倾影响	(139)

第4章 打破“围剿”，兴起抗日救亡文化

一、文化界掀起抗日救国运动	(147)
二、白区文化运动的新发展	(158)
三、踏着鲁迅足迹	(164)
四、新局面	(179)

结束语

附：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文化工作大事记	(208)
主要参考文献	(219)

第 1 章

文化战线新的一页

一、白色恐怖

1927年，蒋介石、汪精卫反革命集团相继背叛革命，国民党在“清党”、“分共”的名义下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屠刀，实行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。从此，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，国民党本身也由一个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，蜕变成一个代表地主、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。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的需要，这个反动政党不但大肆屠戮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，同时也加紧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。

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强文化统治的首要一点，就是在训政的名义下实行“思想统一”，并且试图确立一个主义、一个党、一个领袖，对全国人民实行统治的政治体制。

蒋介石鼓吹的思想统一，实际上是为其巩固领袖地位，实施独裁统治服务的。他篡改、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，完全不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发展变化，而是断章取义，随意从孙中山言论中摘取他们所需要的内容，妄图以他们篡改和阉割后的所谓的“三民主义”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，反对共产党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

思想。他利用孙中山在 1914 年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提出的军政、训政、宪政三时期依次推进论,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民众太落后、太无知、太缺乏政治训练,完全没有资格实行宪政的条件,要全国人民统一于他的思想之下,来实行他的“训政”。

1928 年 2 月,蒋介石召开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,就是一次“统一思想”的会议。会议提出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,同心协力铲除共产党的理论,妄图从思想和理论上肃清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。同年 8 月,蒋介石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,正式决定实行“训政”。9 月,蒋介石发表讲话,宣称要拿三民主义统一全国思想,三民主义是唯一的中心思想,不允许再有第二个思想,不能允许共产主义存在于今日。10 月,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《训政纲领》,宣布在训政期间,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,对国民进行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监察的训练。1929 年 3 月,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以“总理主要遗教”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,规定国民党独负全责,领导国民,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、治权。会上还公开提出了一项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议案,宣布一切违反三民主义的人均属“反革命分子”,凡经国民党省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,均以反革命罪论处。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,大肆屠戮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,正是以它的“思想统一”为依据的。

其二,实行国民党党化教育。

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“党化教育”来贯彻实施“以党建国,以党治国”的根本大计。1927 年 8 月,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《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》,并公布《各级学校规程》及《私立学校规程》。规定学校教育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的方针。根据此项方针,要求重新改组学校课程,审查和编著教学用书,用管党的方法管理学校与学生。对那些悖于党化教育的进步学校,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查封。1929 年 5 月,查封上海的建华